

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Frames of War

Judith Butler



战争的框架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何磊 译

Frames of War

Judith Butler

战争的框架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何磊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的框架 / (美) 朱迪斯·巴特勒著; 何磊译

.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49-2465-2

I. ①战… II. ①朱… ②何…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834 号

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2009 © Judith Butler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NUP

豫著许可备字 -2016-A-0163

战争的框架

著 者 [美] 朱迪斯·巴特勒

译 者 何 磊

责任编辑 刘淑颖 王明娟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53千字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致谢	1
平装版导言	5
导言 脆弱不安的生命·可堪哀悼的生命	37
第一章 生存能力·脆弱特质·情感反应	85
第二章 刑求虐待与摄影伦理: 与桑塔格 一同思索	129
第三章 性政治·刑求虐待·世俗时代	185
第四章 规范粉饰下的闭目塞听	236
第五章 非暴力主张	275

致谢

本书收录的几篇文章写作、修订于 2004 至 2008 年间。尽管其中几篇文章的初稿曾经发表过，但在成书之际也经历了大幅修改。第一章《生存能力·脆弱特质·情感反应》的初稿曾在 2008 年由巴塞罗那当代文化中心 (Centre de Cultura Contemporània de Barcelona) 以英文、加泰罗尼亚文双语发表。第二章《刑求虐待与摄影伦理》的初稿曾发表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会刊《社会与空间》 (*Society and Space*)，以及琳达·亨彻尔 (Linda Hentschel) 主编的《战争时代与恐怖时代的图像政治：媒体、权力与两性关系》 (*Bilderpolitik in Zeiten von Krieg und Terror: Medien, Macht und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该书由柏林 b_books 出版社于 2008 年出版。第二章也引用了本人 2005 年 12 月发表在《现代语言学刊》

(*PMLA*) 上的《摄影·战争·义愤》(“Photography, War, Outrage”)一文。《性政治·刑求虐待·世俗时代》一章最早发表于2008年3月的《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期号为59:1。《规范粉饰下的无知》一章源自我对《性政治》讨论文章的回应, 同样发表于《英国社会学杂志》, 期号为59:2。《非暴力主张》源于2007年秋季发表在《差异》(*differences*)杂志的《规范的暴力与非暴力: 答米尔斯与詹金斯问》(“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of Norms: Reply to Mills and Jenkins”)一文。2008年春季, 我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开设研讨班, 其间也与众人就本书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

过去几年来, 我曾与各位学界同侪进行过对话交流, 这些讨论也启发、改变了我的思考, 我要感谢以下诸位: Frances Bartkowski、Étienne Balibar、Jay Bernstein、Wendy Brown、Yoon Sook Cha、Alexandra Chasin、Tom Dumm、Samera Esmeir、Michel Feher、Eric Fassin、Faye Ginsburg、Jody Greene、Amy Huber、Nacira

Guénif-Souilamas、Shannon Jackson、Fiona Jenkins、Linda Hentschel、Saba Mahmood、Paola Marrati、Mandy Merck、Catherine Mills、Ramona Naddaff、Denise Riley、Leticia Sabsay、Gayle Salamon、Kim Sang Ong-Van-Cung、Joan W. Scott、Kaja Silverman、Linda Williams。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人文研究基金（Humanities Research Fellowship）与 Janet Broughton 院长慷慨相助，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本书写作。感谢 Colleen Pearl 与 Jill Stauffer 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当然本书中的一切疏漏皆由我负责。感谢左翼书局（Verso）的 Tom Penn 策划编辑本书的出版计划。我的学生激励、冲击着我的思考，这部著作也献给他们。

本书定稿的一个月前，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我们尚不清楚，在其治下，美国会如何纠正战争带来的恶果。本书内容可以说是由布什当局发动的战争所引发的，但我坚信，这些反思绝不仅仅适用于布什当局的荒唐行为。针对战争的批判源自战争造成的局面，其目的乃是重新思考社会纽带的错综复杂与脆弱不安。如何让暴力不再

那么容易发生？如何让所有生命都受到同等的关爱、呵护、怜惜与哀悼？如何让生命真正拥有作为生命的尊严？思考这些问题，同样是本书的目的。

平装版导言

本书汇编了几篇内容不同但主旨接近的文章。全书没有统一的论点，只有关于下列问题的一系列探索与思考：视觉与话语领域何以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它们何以成为战争的帮凶，在准备战争、发动战争的过程中为虎作伥？对此问题，本书不仅想要提供描述与分析，更想要提出批判和反对。这是因为，战争之所以能够发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想反对战争，就必须了解甚至重构此类促成战争的条件。同样，如果想要反对战争，我们必须了解支持战争的民意是如何塑造、如何维持的。换言之，我们必须了解战争对民众感知的影响——在其作用之下，大众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战争是无可避免甚至合乎道义的“好”事。

任何试图理解战争的分析都必须思考战争的

发动方式与技术手段，但是，要想理解这些技术手段的运作方式，我们就必须思考其在感知领域所发挥的影响。在技术手段的掌控之下，在视觉与话语的传播之下，战争的塑造与框定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所谓的掌控与传播本就是阐释的手段，它可以解释谁的生命是生命，谁的生命只能沦为工具、目标、数字，只能在战争的摧毁之下残留蛛丝马迹，甚至只能消失得杳无踪迹。尽管本书没有就此问题提出全面彻底的解释，但也深入探讨了关于这种解释的各种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反思唯物主义的既有概念，理解拍摄设备（照相机、摄影机等）在战争中的工具作用（这些设备如何在框定、塑造人类与非人类目标的同时造成间接伤害——战争必然导致这一结果，但人们却总是容易忽视这一问题），并且提出某种反战的政治观点（它将关注战争对生命造成的践踏与破坏——我们必须以新思维、新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

战争如何发动？其具体形式如何？思考此类问题时，我们总是首先想到战争的物质工具，以为自己很清楚所谓“物质工具”的含义。即便人们认同相机之类的拍摄设备是战争的物质工

具，想必大家也很难同意，拍摄设备本身就可以发动战争，或者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当然，常识告诉我们，发动战争的主体是人，而不是人所运用的工具。但是，如果工具拥有了自己的能动力量，人反而沦落成为工具的附庸，我们又该作何理解？目标群体可能会成为战争的工具，近来以色列军队为自己在加沙地带造成平民伤亡提供的辩解就能说明这一点。当士兵与武器融为一体时，他同样可能沦为武器的附庸，而拍摄设备与拍摄目的之间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当战争决策者将目标人群视作军队进攻的手段、文明的威胁或是难以掌控的潜在麻烦时，战争手段便会锁定这些目标人群，活生生的人类便将沦为战争的工具、障碍、目标或掩护。使用拍摄设备的人经常身处于战场之中，于是也经常具有战士与记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在图像与视觉领域神化战争暴行的人。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追问战争的物质层面：何谓“物质”？拍摄设备与图像记录算不算战争“物质层面”的一部分？

尽管我们认为图像具有几分物质性，但还是倾向于认为战争的物质层面主要是指枪炮之类具有直接杀伤力的战争工具，却没有意识到，没有

图像的协助，这些工具根本无法使用。^[1] 聚焦于目标的行为塑造了士兵、记者与观众的主体地位，这种聚焦催生了视觉领域，也让上述各类主体地位得以出现。框架不仅塑造了上述地位，还限定了视觉领域的范围。以战争摄影为例，图像可以反映或记载战争。有时候，图像可以激发支持战争或者反对战争的情感反应。而其他时候，图像又成了对待战争的矛盾政治态度汇聚之所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图像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呢？导弹与炸弹装置上本身就装有摄影设备，有时它们甚至可以取代人力操纵的作用——比如，无人机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破坏威力就不可小觑。无人轰炸机的空袭定位并不精准，相较于袭击目标而言，其破坏能力显然过于强大，因此它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通过树立、设置关于真相的感官限制因素（比如限制可见、可听的范围），针对战争影像与叙事层面的控制手段也就限制、掌控了舆论。所

[1] 关于锁定军事目标时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哈伦·法洛奇（Harun Farocki）在影像层面进行了卓越的探讨，见法洛奇的几部作品，如2001—2003年的三部《眼睛机器》（“Eye Machine, I, II, III”）以及2003年的《远程战争》（“War at a Distance”）。

以，我们有必要追问，针对可见、可听的限制究竟是不是战争之所以能够发动的前提条件？其限制又究竟是不是摄影设备以及其他传播技术手段导致的结果？人当然会使用工具，但工具同样可以操纵人（机器可以定位人，可以为人赋予视角，也可以记录人的行动轨迹）：工具塑造、框定了能够进入视听表征领域之内的人，同时也排除了无法进入该领域的人。更有甚者，在战争的作用下，“人类身份”（personhood）也沦为了战争的工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战争的视觉技术手段如何塑造公共领域？公众又会如何反抗战争及其塑造的“人类身份”？民众会以各种方式回应战争，而极具感染力的回应方式不仅能够建构战争背景下的“人类身份”，还能解构这种身份。我们能否找到改变民众感知的战争表征方式？而感知层面的转变又能在终止战争的诉求中发挥何种作用？在植入式报道的作用下，在喉舌媒体报道的冲击下，旁观战事的观众难免震慑于政府的“壮举”，甚至人心也有可能受到战事的蛊惑收买，而我们怎样才能抗拒这种收买与蛊惑？要想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如何重塑感知？此举又能如何重塑民众关于战争的感知？

要想应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理解感知在收编行为当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当我们观看或收听战事报道时，我们与试图动员、收编我们的战事报道之间存在着某种认知关系，这种关系究竟如何？在人们被动接受战事报道时，某种关于现实真相的框定效果（现实的限定与阐释）影响着人们的感知，关于战争的现实真相也由此得到塑造与确立。针对如何报道战争甚至要不要报道战争的问题，当局制定了各类方针指令，似乎试图以此约束人们对暴行的理解方式，管控暴行在公共领域内部的表征方式——但互联网以及其他各类数字媒介极大地改变了当局试图掌控的领域。然而，针对暴力表征的管控本身是否属于暴力？要想了解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谨慎地区分炮火造成的破坏以及这一现实的表征框架，尽管两者同时出现、缺一不可。阿尔都塞曾经引用斯宾诺莎的观点指出，物质现实的种类不止一种。同理，暴力及其物质工具的种类肯定也不止一种。如果说框架就是战争物质现实的一部分，如果说框架正是战争暴力的产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说法？

框架不只是单纯地呈现现实，而是积极地进行控制，有所选择地制造并强化所谓的真实。框

架试图框定真实，其作用效果也十分显著。尽管框定作用并不总能控制可见、可知的范围，但它仍然始终以塑造现实为目标。这就意味着，框架总是会排除、排斥某些内容，它总是会否定其他“现实”版本的真实与合法地位，摒弃一切有悖于“官方”版本的异端。框架不停地丢弃关于战争的“非法”表征，这些“垃圾版本”堆积在一起，每一块碎片都能成为潜在的反抗契机。当框架排除、丢弃“非法”的表征版本时，这些表征便沦落到了“不真实”的领域，成为威胁、困扰“真实”表征的魑魅魍魉。所以，框架试图设置针对哀悼的禁令：没有生命死亡，也没有生命逝去。框架为虎作伥地强化了战争的破坏行为，但它们只能对这种忧郁之举发挥粉饰作用，试图扼制愤怒，却总是以失败告终。框架参与了战争暴行的全过程（作为武器的一部分，它开启了屠戮生命的暴行；作为报道的一部分，它完成了暴行的收尾工作），它试图令整个表征领域都听命于战事的需要。尽管如此，要想达到其目的，框架必须成功地动员、收编公众。因此，反对战争的伦理责任便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抵抗住框架乃至战争的收编。

人们可能会认为，非主流图片的流传可以引

发反抗战争的呼声。但必须注意的是，图像可以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炒作事件那么简单。如果只是耸人听闻的炒作，人们可能偶尔会对不公不义之事感到义愤，但这种即时的情感无法转变成持续的政治反抗。面对战争技术针对表征领域的限制，面对事件炒作带来的短暂轰动效应，我们能不能推动感知领域，或者由该领域出发，找到新型的反抗策略？

由于复制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今人们几乎无法控制图像的传播。但这种难以控制的特质并不足以让人欣喜地幻想乌托邦。数字世界的图片可以超越任何人的审查与掌控之举，有时甚至可以偏离创造图片的任何初衷。图片的扩散以全新方式塑造出新的意图，将图片暴露到新的塑造条件之中，最终还有可能产生与“原创者”意图背道而驰的效果——原创者的本意乃是借图片来反映、巩固自身的掌控与主宰，但最终只能事与愿违。^[1] 阿布格莱布虐囚照片在网上的疯狂传播

[1] 见 W·J·T·米切尔 (W. J. T. Mitchell):《复制恐怖: 9·11 事件至今的图像战争》(*Cloning Terror: The War of Images, 9/11 to the Present*),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1 年即出。

即属此类，而图片不受控制的传播能力及其接受情境的不断变化的确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反战的呼声。

但在另一方面，同样的传播能力也有可能使战争的恶果得到扩散，让人们无法意识到战争造成的损失，甚至将其恶果认作日常生活的寻常基调。一旦战争在视觉领域造成的后果成为日常生活的背景，就会产生上述效应，而摧毁人们的清醒认识则是战争的另一种间接危害。所以，传播能力的增强未必代表着视觉技术的乌托邦式进步。这是因为，在技术发展的作用下，当前战争大有侵入民众日常生活之势。

所以我们必须追问：鉴于当前的阿富汗局势，如果不提前塑造民众关于战争的理解，如果不压制一切有可能引发反战情绪的视听表征或叙事阐释，战争有没有可能得到延续甚或升级？关于战争的电视报道将公民置于视觉消费者的地位：观众旁观着发生在远方的暴力冲突。至少在美国，同所谓敌人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可以轻易地发动战争，而毋需审慎思考自身的行动决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类的国际媒体甚至输出了美国的视角，让身处暴力之中的民众误以为自己离战争非